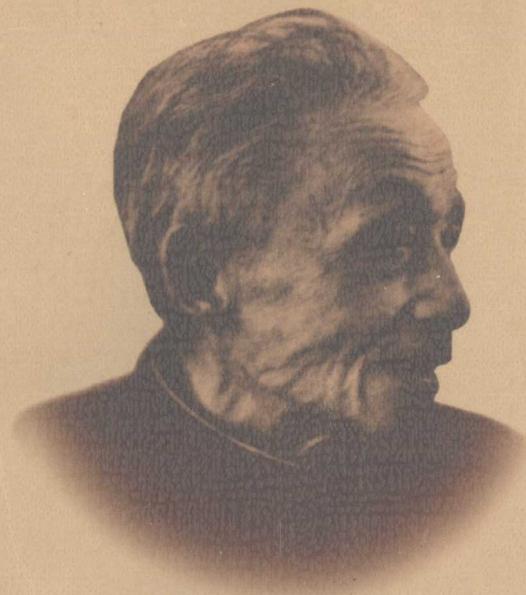


● KANG ZHUO WEN JI



康濯文集

短篇小说

1

1217.2

310252

114

唐湜文集

短篇小说

湖南文艺出版社 · 一九九八

[湘]新登字002号

康濯文集

责任编辑：李恕基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4.125

字数：1,66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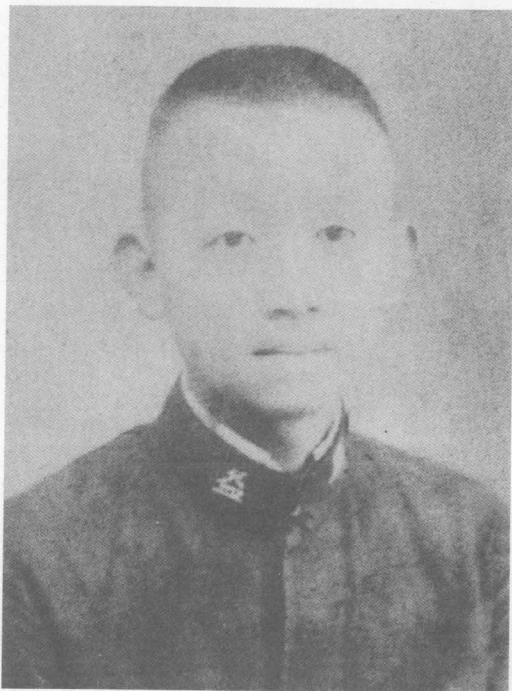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—5404—1838—9

I·1465(全五册) 定价：94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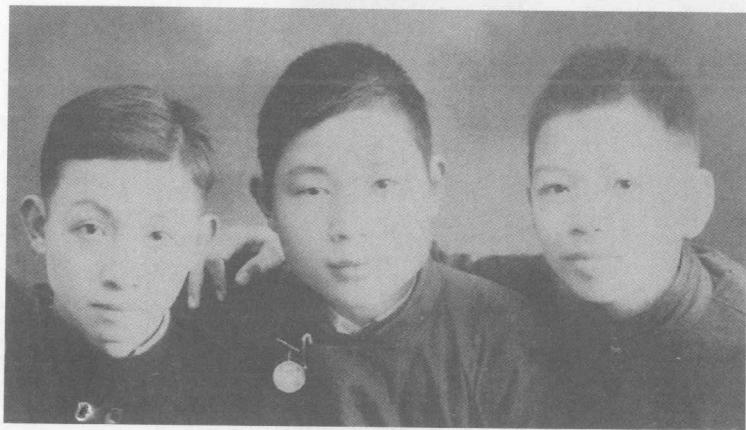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千淘万漉虽辛苦
吹尽狂沙始到金

康濯墨迹



1933 年于
长沙广益中学



1937 年 12 月于湖南长沙高级中学(简称长高),左起毛季
常(康濯)、朱无难、谭炳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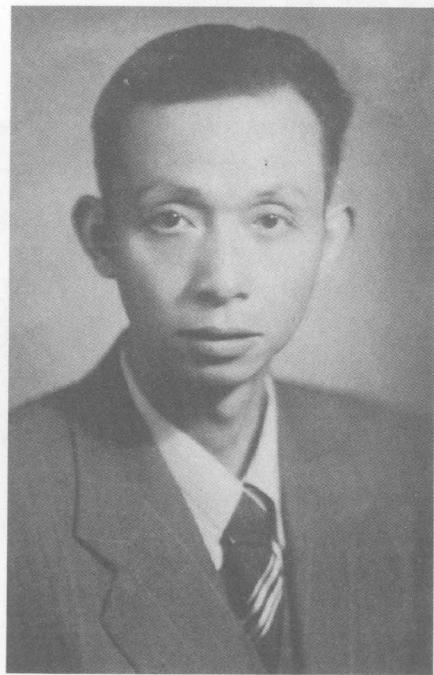
1946年9月19日于张家口，《初春》、《我的两家房东》、《明暗约》等小说均写于此时。与未婚妻勉思合影。



1939年6月
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



1947年2月于
河北省阜平县抬头
湾村,左起:康濯、丁
玲、蒋祖慧(丁玲之
女)、田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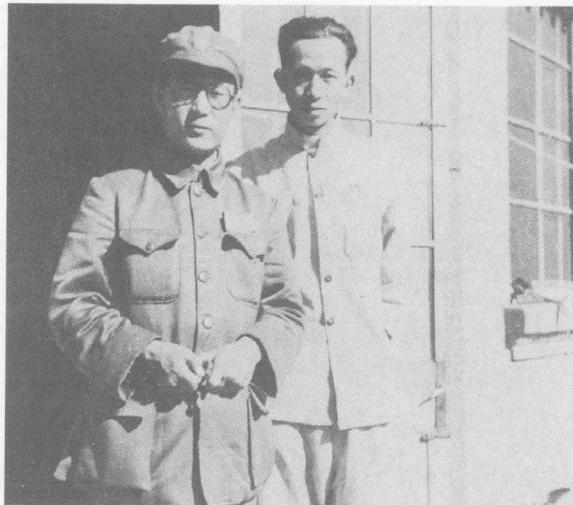
1951年10月
摄于莫斯科



1951年10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。中间三人：康濯、冯雪峰、陈企霞，左一为瞿独伊。



1951年于北京鼓楼东大街文学研究所。左起：田间、雷加、周立波、康濯。



1954 年至 1957 年康濯、侯金镜、秦兆阳任《文艺报》常务编委。此为与侯金镜同志合影。



1960 年初，与李准赴河南深入生活，在遂平县嵖岈山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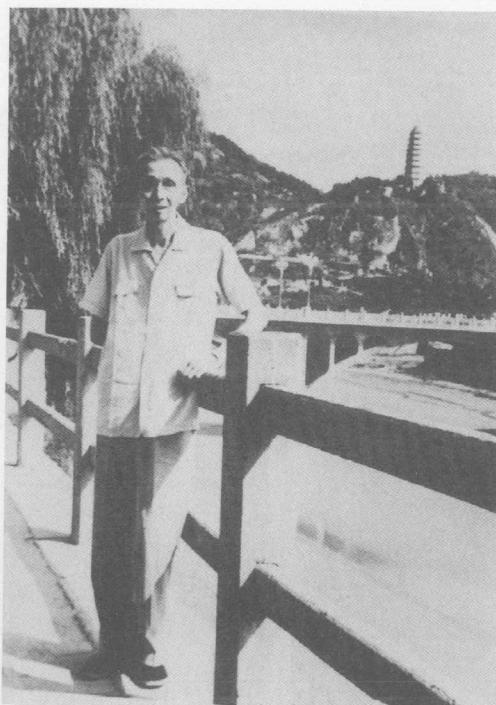
1978年在湖南省文联院内，怀抱未满周岁的孙儿毛大江。



1979年在北京与延安鲁艺文学系老同学合影。左起：那沙、天蓝、肖殷、康濯、田蔚、周游。



1979年10月与
肖三、丁玲同志合影。



1985年重返延安
于宝塔山前。



• 1985年女儿陶亮在美国得硕士学位后，回国省亲，与父亲合影。



由于康濯突然逝世，全家万分悲痛，于1月16日在安定门家中设祭。

代序一

这本集子包括《亲家》、《抽地》、《腊梅花》三个短篇，内容都是关于晋察冀农民和土地问题的。《抽地》和《腊梅花》在抗日时期写成，我觉得这点很值得注意。作者在那伟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战争里，就注意到这个实际上是根据地人民生活思想的主要变动了。

我们的抗日战争不能从那一个长时期在农村中兴起的风云分开。农民在炮火中，在严重的生死考验里，在生产，甚至在1941年以后那几年的苦难灾荒里，觉醒并巩固了对土地的要求。

农村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削弱封建势力的错综复杂的斗争里，农民，以及由农民产生的担负重大革命任务的干部们，都是在这个斗争里受到教育并成长起来。

抗日期间，我们写的抗战故事多，有时联系到农村中一些风习的变革，例如婚姻自主，文化娱乐等。深入并生动地写出农村的土地斗争中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，像这本集子所表现的，还不多见。

自然，平分以后，关于农村的作品多了。但我觉得在抗日期间，我们在农村工作里打下的基础，是很可宝贵的，应该反映的。

在反映这一点上，我觉得康濯做得很好，他的作品全部都是写的晋察冀，阜平、平山一带的农民故事。

关于阜平，我们想起来，那在全中国，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。好年月，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。回想起来，那是怎样“烂酸菜”呀，连点盐也是不放的。但是阜平，在我们这一代，该是不能忘记的了，把它作为摇篮，我们在那里成长。那里的农民，砂石，流水，红枣，哺育了我们。

作者头戴一顶毡帽头，身披一件蓝粗布袄，在这一段山路上，工作了该是十年吧。作者对这一带农民的生活很熟悉，特别熟悉他们的斗争生活。十年来，他熟悉了这一带的语言，并在文字上掌握了。在目前我们的文学作品里，有一种是以故事见长，有一种是以生活见长。《亲家》属于后者。

如果只是故事，不能更磅礴、更深入地联系到人民的生活的本质变动，不能反映党的政策、党的组织领导力量，在社会各个阶层、各种人物身上所引起的变化，兴起的作用，如果故事只是动听和新奇，那自然不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高要求了。

在这本集子里，农民的形象是多样的，有受多年封建残害的老一代，有在斗争里站立起来并学会领导的干部，有新的在自由天地里飞翔的年幼的一群，这几种形象被同一个强烈的光芒照耀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政策和教育。

在光芒的照射抚育下面，引起变化的，不只是农民的生活形态，也包括思想感情、文化和语言。

作者表现这些农民生活的成功地方是丰富、精细而生动。

1949年9月

代序二

悼 康 濯

孙犁

整整一个冬季，我被疾病折磨着，人很瘦弱，精神也不好，家人也很紧张。前些日子，柳溪从北京回来说：康濯犯病住院，人瘦得不成样子了。叫她把情况告诉我。我当即写了一封信，请他安心治疗，到了春暖，他的病就会好的。但因为我的病一直不见好，有点悲观，前几天忽然有一种预感：康濯是否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季？

昨天，张学新来了，进门就说：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我没等他说完，就知道是康濯了。我的眼里，立刻充满了泪水。我很少流泪，这也许是因为我近来太衰弱了。

从 1939 年春季和康濯认识，到 1944 年春季，我离开晋察冀边区，五年时间，我们差不多是朝夕相处的。那时在边区，从事文学工作的，也就是那么几个人。

康濯很聪明，很活跃，有办事能力，也能团结人，那时就受到沙可夫、田间同志等领导人的重视。他在组织工作上的才能，以后也为周扬、丁玲等同志所赏识。他和我是很亲密的。我的很多作品，发表后就不管了，自己

贪轻省，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。他都替我保存着，不管是单行本，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。例如油印的《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》、《晋察冀文艺》等，“文革”以后，他都交给了我，我却不拿着值重，又都糟蹋了。我记得这些书的封面上，都盖有他的藏书印章。实在可惜。

“文革”以前，我写给他的很多信件，他都保存着，虽然被抄去，后来发还，还是洋洋大观。而他写给我的那两大捆信，因为不断抄家，孩子们都给烧了，当时我并不知道。我总觉得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对不住他。所以也不好意思过问，我那些信件，他如何处理。

1956年，我大病之后，他为我编了《白洋淀纪事》一书，怕我从此不起。他编书的习惯，是把时间倒排，早年写的编在后面。我不大赞赏这种编法，但并没有向他说过。我和我的老伴，也说得来。孩子们也都知道他。1955年，全国清查什么“集团”，我的大女儿，在石家庄一家纱厂做工。厂里有人问她：你父亲和谁来往最多？女儿不知道是怎么回子事，想了想说：和康濯。康濯不是“份子”，她也因此平安无事。

他在晋察冀边区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写了不少作品。那时的创作，现在，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，是像李延寿说的：潜思于战争之间，挥翰于锋镝之下。是不寻常的。它是当国家危亡之际，一代青年志士的献身之作。将与民族解放斗争史光辉永存，绝不会被数典忘祖的后生狂徒轻易抹掉。

至于全国解放之后，他在工作上，容有失误；在写作上，或有浮夸。待人处事，或有进退失据。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。要知人论世，论世知人。

近些年，我们来往少了，也很少通信，有时康濯对天津去的人说：回去告诉孙犁给我写信，明信片也好。但我很少给他写信，总觉得没话可说，乏善可述，他也就很少给我写信，有事叫邹明转告，康濯记忆很好，比如抗日时期，我们何年何月，住在什么村庄，我都忘记了，他却记得很清楚。他所知文艺界事甚多，又很细心，是个难得的可备咨询的人才。